

赵衡文集

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：“新批评派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，依然在指挥我们。”

·
重访新批评

The New Criticism
Revisited

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访新批评 / 赵毅衡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3. 3

(赵毅衡文集)

ISBN 978-7-5411-3686-3

I. ①重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文艺评论—研究

IV. ①I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0814 号



CHONGFANG XINPIPING

重访新批评

赵毅衡 著

责任编辑 贺 树
特约编辑 任 伟
责任校对 贺 树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封面设计 任 熙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50mm×230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190 千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686-3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导论：新批评与当代批评理论

一、新批评与我，与我们

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访？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：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访。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重访。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，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：“讨论具体作品时，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。”“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，依然在指挥我们。”

对我，对每个文学学生，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。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，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：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，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直接读拉康。要了解现代文论，无法不读形式论，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，就绕不开新批评。正因如此，本书也就有不得不出理由。

在这一层理由上，新批评派与其他派别相同。然而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，让我们更加必须重新拜访新批评派。第一个理由是，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。我的学术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，当年我选中新批评做研究课题，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社会科学院读硕士。那时精力比现在好，心气比现在高，做学问讲究一个“彻底”，也有下苦功夫的劲头。当时我的原则是：凡是做一个题目，落笔之前必须通

读全部必须读的文献；一旦书成，要准备后来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见解，但是至少在资料详备上不会轻易过时。

1978年，我到社科院跟着卞之琳先生读莎士比亚，每过一个月左右到先生干面胡同的书房里。按先生的布置，写一些读莎笔记呈交先生，他说可以才写成文交给刊物。记得是第二年，卞先生突然说：“我看你的兴趣在理论。”我听了有点吃惊：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学子，避“理论”唯恐不及；觉得尽是一些“理论家”在吵闹不休，争论上纲上线互指祸国殃民，说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废话，有出息的学生应当读出作品灵气，写出优雅文字。卞先生怎么会发现我“兴趣在理论”？

回想起来，应当说先生眼光极准：我的确是太喜欢在品赏文字上说出一个名堂。当时先生不等我结束犹疑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就从新批评做起，一步步做到当代。”

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，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：瑞恰慈数次留在中国执教，对中国情有独钟；燕卜苏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，戎马倥偬中，靠记忆背出莎剧，作为英语系教材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。穆旦、巫宁坤、郑敏等人，四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（R. S. Crane），奥格登（Richard Ogden）等人，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（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），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。1948年燕卜苏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赴兰色姆召开的会议，今天的家常便饭，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纪录：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集会，“文学理论”竟然重要到召开“国际会议”；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，煞风景的是燕卜苏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“金圆券”去买机票。

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课题：中国的介绍，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：卞之琳、钱锺书、吴世昌、曹葆华、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，而且这些前辈七十年代来都在社科院。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、叶公

超、浦江清、朱希祖、李安宅等等，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。卞先生解嘲说：“三十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‘现代文学理论’，我也去听了，一点也没有听懂。”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。

后来我读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《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》，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，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，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，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，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苏，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，几乎是在“批判资产阶级”的名义下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借编《新批评文集》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，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苏，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：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，陷入昏迷再没有醒来。

卞先生劝我研究新批评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。七十年代末，新批评已经“过时”，那时，连结构主义也正在“过时”，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：转向了。这个局面，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，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：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，可以从头起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。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：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，何不悠游源头，再顺流而下？把一个个派别的来龙去脉，优点缺点，都研究清楚。

如此想法，现在不免被视为老派。君不见个个学子都赶趋新潮，生怕落伍？我每次回国，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：“国外有什么新潮流？”我不喜欢这个问题。倒不是因为老气横秋看不起新潮，而是唯新是鹜常令人啼笑皆非。许多“新”潮流，往往是为新而新，“追新族”，更是还没有说顺一个新名堂就打出新牌子，结果除了名称其他都不太新。理论不是时装，理论应当批判时髦，总不至于让理论来批判理论的时髦？

记得1980年见到钱锺书先生，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，我说在细读新批评。他马上问：“也读维姆萨特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“那么读了

Day of the Leopards?”我说：“读了。”先生眉开眼笑。《豹的日子》是维姆萨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，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。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，虽隔了四年，绝对算新作。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及时，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，普遍认为《管锥编》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。无独有偶，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（Geoffrey Hartman）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 *Boundary 2* 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，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维姆萨特，剧谈《豹的日子》。好书的确就是好书，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。

在日丹诺夫式的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理论的粗暴统治的半个世纪中，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。这个多年的潜流，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传统。

从新批评开始，用了二十年时间理清从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途径，同样，我也花了二十年时间，一点点发现中国与西方文化人的“对岸经验”。这两条我一生从事的课题，都是卞之琳先生慧眼指点。先生仙去，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。当时觉得来日方长，如今才明白时不我待，深夜扪心，汗不敢出。

像所有重要的“过时”学派一样，新批评做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。如今写文学评论，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，例如张力、复义、反讽、悖论等等。新批评还有一个好处，它与作品结合得很紧，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以创作鸣于世（艾略特之诗人地位不用介绍了，燕卜苏被视为英国现代诗歌奇才，兰色姆、退特等都是美国现代诗选本不可或缺之人，沃伦的小说极受欢迎，名著《国王的全班人马》两次被拍成电影并得到奥斯卡奖），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论，其批评方法简便清晰，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，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，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。

“超越”了新批评的诸家，不得不具体分析作品时，用的依然是新批评开创的细读。雅克布森与列维-斯特劳斯分析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《猫》，一首诗读出几十页的分析；巴尔特读巴尔扎克中篇《萨

拉辛》，读成一本书；苏珊·库巴《阁楼上的疯女人》细读《简·爱》，从对一个“次要人物”的反讽处理，引出全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观。最近，“后经典新叙述学”的代表人物费伦分析石黑一雄的小说《长日回光》，从极细致的细读中抽丝剥茧地引出论辩。我先后在一些国家指导文学博士生写论文，我再三强调的基本原则是：“先细读作品再进入理论，无论你的理论是后殖民还是后现代。”我发现其他教授指导学生，可能措辞有所不同，用的却也是这条原则。

新批评已经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一生重访一次，恐怕是文学学生必须做的功课。对任何国家的学生如此，对中国学生更是如此。

二、现代批判理论的“银河效应”

新批评派不断卷入争论，是在争论中成长的，因此成为第一个“成功的”形式论派别。这点本书中讨论得很多：只有在论战辩驳中才能看清一个理论。我在本书中想把新批评以及形式论放在更大的学术背景中，看新批评“之后”，形式论与其他批判理论派别的分合大势。

二十世纪初是个很神奇的时代：艾略特和瑞恰慈，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，索绪尔与皮尔斯也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；有人追述说是形式论潮流起自德国，这种历史追索反而可能是“非历史的”，因为这些理论家不形成一个历史环链：正在英国开始叙述形式研究的詹姆斯·福斯特、勒博克等人完全不知道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。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，自发同时出现在欧美各国：从莫斯科，彼得堡，布拉格，日内瓦，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，他们不了解别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。他们很不同的回答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，相似课题就有了多样的答复。

比较文学家多罗采尔（Lubomír Dolozel）在《西方诗学传统与进程》（*Occidental Poetics: Tradition and Progress*, Lincoln: Uni-

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1980) 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“星座效应”(Constellation): 相近学派几乎同时出现, 群星灿烂, 虽然没有中心但围聚在相似问题周围。多罗采尔认为这是由文化气候决定的: “浪漫主义之后, 形形色色的诗学有个共同点, 都是广义上的形态学研究。”艾略特和瑞恰慈与罗素相熟, 他们可能感到, 却不可能知道, 西方整个哲学思潮在经历一个“语言转折”。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, 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做例外。

但是二十世纪文论的群星爆发, 规模实际上大得多。这个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, 实际上是由四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, 形式论是其中之一。

二十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, 是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形成的, 却在二十世纪初年由普列汉诺夫、卢卡契、葛兰西、布洛赫、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, 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的文化转向。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, 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。可以说, 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, 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; 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, 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。

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, 是精神分析。这一支的发展, 一直不被看好(例如鲁迅的讥评, 巴赫金的嘲笑, 新批评派斥之以“意图谬见”, 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), 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, 大师不断。我想一个基本原因, 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, “快乐原则”渐渐超出“现实原则”, 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。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, 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, 就是证明。

第三个理论体系, 是现象学/存在主义/阐释学, 这条发展线索, 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, 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的是结束形而上学。因为这个传统顽强, 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。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, 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。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: 伽德默与德里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论争, 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。

形式文论/符号学/叙述学，这一体系，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。从“前结构主义”的各学派（新批评，俄国形式主义，布拉格学派，前期叙述学），到结构主义汇合各种理论，进入后结构主义，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，着力点一直没有变，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，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“叙述转向”。

对当代文论做出重大贡献者，侧重点各有不同，目标有所区别，但是总是结合几个体系，而且少不了形式论。八十年代前，学者们似乎满足于两线结合，自从三十年代初燕卜苏等人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，此后成了几乎所有文论家的两门看家本领。马尔库塞、弗洛姆等人，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，主要就是为了结合精神分析；巴赫金学派，实为“形式论马克思主义”；拉康的出发点，是语言分析的弗洛伊德主义。八十年代后，越来越多的人，用三线结合：克里斯苔娃（Julia Kristeva）是女性主义，加符号学，加精神分析；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是后结构主义，加性别研究，加符号学；齐泽克（Slavoj Zizek）是精神分析，加意识形态研究，加新马克思主义；波德里亚（Jean Bauderillard）的研究是符号学，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。

为什么我这里称为理论方法，而不是称作单独的学科？因为这些支柱理论的有效性，在于它们在文学、文化批判实践中的应用，而不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：弗洛伊德主义，常被心理学家看成“不是专业理论”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理论，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，不是一回事。这在阿多诺与他的学生打官司事件中早就可以看出；历史学界许多人批评福柯，认为他不是合格的历史学者，哲学界更多人批评德里达，认为他不是严格的哲学家。符号学作为学科，与专业语言学家往往冲突；新批评讨论反讽，与哲学家很不相同。批评理论的大师，往往在“本行”受同行诟病。

不过我们可以看出，“星座效应”实际上是“银河效应”，也就是说，喷薄而出的是一批而不是一个星座，这四个“星座”同时产

生，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关系，但是共同的路线是“元批评”（meta-criticism），是穿过现象寻找底蕴：马克思主义找到意识形态，弗洛伊德找到力比多，胡塞尔找到意向性，而新批评等人找到形式构造。寻找底蕴运动的结果，是使二十世纪变成了理论世纪：人们突然发现经验现象固然有趣，范型的变化可以使现象更加丰富，就像不同提喻会使对象世界变幻无穷。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，可以势同水火，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。

我在本书中，说到新批评派的燕卜苏、伯克等人率先把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，当初这是令人侧目的怪异做法，到六七十年代之后，成为学界常规，可以说每个重要的批评家，都是这四派理论的继承者；每个理论家都熟悉这些支柱理论，只是每个人用不同搭配，朝不同应用对象推进。而且，每个理论家都不得不谈到符号形式或叙述形式，形式论在现代理论中已经是不可或缺。

文学作品虽然经常是讨论的出发点，现代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“文学理论”，甚至不再局限于“文化理论”，只能以“批判理论”这样笼而统之不分对象的术语名之。在很多国家，例如中国，这个理论要进行的不仅是批判，还要建设（例如建设在西方学界认为早就已经解构了的“主体性”）。当代批判理论看起来像个大拼盘。

批判性，是这个理论的最关键词。电影，电视，歌曲，传媒，广告，流行音乐，各种语言现象——文化的各种门类，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讨论的对象。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，不是批评理论所关心的，赞美演出成功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。因此，像行为艺术，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，哪怕很技术性的研究，也会出现于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中。同样，“类文化”门类，例如体育，娱乐，建筑，科学伦理，时尚，城市规划，环境规划，这些领域专业性的评论，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，批判理论是专门用来挑刺的。

反过来，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，越来越成为这个“文论”的关

注点。全球化问题，第三世界经济受制裁问题，“文明冲突”，意识形态，所有这些大政治问题，都是批判理论的注意目标。批判理论不仅直接讨论政治题目，批评理论讨论文学与文化时，也往往归结到政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当代文论越来越“泛政治化”。本来“文化政治”就是学术中的政治，现在政治本身成了批判理论的目标。

知识分子应当为公共事务仗义执言，但如果在专业上无发言权，在公共事务上也就雷同一个普通网民。这种困惑，是最近二十年出现的。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：文学理论，艺术理论，文化理论，社会批评理论，因对象不同而分清界限，现在的文学系教师，成了理论万金油。开的课名称五花八门，内容却基本重复，学生反复学同样内容，没有一门大致弄清。飞翔固然是乐趣，没有专业的落脚点，飞行后无处落地，无枝可依，学生毕业后，学到不少叫作“理论”的东西，小说却没有读几本，诗歌没有读几首，只是知道了一串术语，写了几篇东抄西凑的作业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很愿意重新回到新批评这种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，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，一直被批为狭隘，现在也显出可爱之处：毕竟，我们还是要读作品，写作品，评作品。一味云里雾里谈“宏大叙述”，固然能满足知识分子褒贬天下的雄心，到最后，毕竟批评者还是得懂如何分析作品。

三、“价值化”与“师范化”

当代批评，是激进批评，因此译为“批判”更为合适。文化批判是当今理论大规模扩容，本来应当是任何学科的人，只要开始进行社会批判了，就加入了批评理论队伍。困难之处，在于专业依然是专业，在专业中进行批判，依然需要专业知识，批判本身却不能代替专业知识。

很多专业，往往要求价值中立，要求不偏不倚，要求专业人士

不预先采取立场。这恰恰是批评理论反对的。批评理论往往是矫枉过正的：不仅可以矫枉过正，往往必须矫枉过正，因为文化主流通常不太在乎批评理论。拿电影“大片”为例，不管批评家如何恶评抨击，制片人及导演本人一点不在乎，因为电影产业已经充分体制化了：决定其命运的是票房。

但是当代文论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任务：新批评正当令的时代，就已经被人讽刺是“师范事业”（pedagogical business），因为，“没有一个固定标准，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。有了一套理论，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个标准。”这个讽刺，应当说是击中要害的，因为当代理论的繁荣，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进入“普及化高等教育”的结果。二十世纪中后期，在欧美各国，大学生人数先后接近同龄人的一半，加上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梯队的需要，各大学的文学系更成为特大系。新批评首先在美国繁荣，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先进入普及化，至今批判理论依然是“在欧洲发明，在北美打天下”。现在中国大学生人数超过同龄人的五分之一，批判理论果然也到了繁荣时期。

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——主要是文科——的产物，这有两个原因。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。当代社会是实用的，受经济利益驱动，学生毕业后，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，不然无法生存。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，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。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，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。

从教师方面说，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，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。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，就只能存身于学院。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，就只能走向边缘，退出社会主流。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。在边缘地位，在学院中，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。

这不是知识分子“失语”，相反，我认为是价值观平衡的必要。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评，提出体制奉行的某种价值，不能失去制衡。他们起的实际上是文化反对派的作用。但是理论的这两个任务（批

判任务，师范任务）不一定能相容，有可能产生冲突：批评理论家多半是新左派。我曾经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·安德森指出，新左派在学院占绝对优势，会让学生，尤其是要争夺奖学金的外国学生，以及要晋升的年轻教师，自觉不自觉地走新左派立场，这样造成“不诚实批评”。他认为我指出的隐患有道理。

理论激进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，就是“对象规定性”：研究者采取的立场有文本来源预先决定：讨论女作家，用女性主义；讨论第三世界作家，用后殖民主义；讨论俗文学，用后现代主义。这样一来，论文读起来像新八股，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，知道其结论。我认为，这将会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就会思念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。维姆萨特的“意图谬见”和“效果谬见”，历来被认为是新批评“自织紧身衣”。维姆萨特把其他新批评派的策略转述为原则，显然很不明智。“意图谬见”反对文本之前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，显然任何艺术表现，作者意图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。但是如果一切由作者的社会关系文化地位前定，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须由东方女性作为表意主体，无须好好读作品就知道结论必定如此，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为千篇一律。

此时就有必要重新访问新批评：或许新批评的文本摆脱意图，认知价值只在文本中，只是一种幻想，但却是值得追求的幻想，尤其在作为一种教师训练法的时候，恐怕更是重要。

四、形式论的必要性

不是已经出现了“文化转折”，出现了“伦理转折”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语言转向不是已经结束？许多社会与人文学科，不是都转向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方向？

可以说，形式论是自我胀破形式主义的。从批评理论的“大历史”来看，以形式研究为跳板，从语言转折到文化—伦理转折，既

是历史的过程，也是逻辑的序列。说得再清楚一些：文化—伦理转折，是语言转折的最新一折：语言转折并没有过时，只是采取了新的方式。

这听起来有点奇怪：语言转向似乎是转向形式，伦理转向似乎是转向内容。实际上，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形式论不仅是表意方式的构筑，更是借形式的构筑给与经验一个伦理目的论：伦理判断是经验的形式构筑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。正是因为形式上的构筑（例如讲通一个叙述，构造一首诗的意义），才彰显了伦理问题。

发生伦理转向的科目，基本上都是以追求“真相”为己任，关于“真相”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就过时，但是一般心理学，历史学等，依然认为被追寻出来的“真实性”中包含着“有效性”（validity）。而文本的有效性，则借重文本在批评中的核心地位，此时，真实性就变成了“文本的可信度”问题。

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玄，但是新批评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兰色姆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晰。在1941年那本给这一派命名的书《新批评》中，最后一章“呼唤本体论批评家”，兰色姆用绝大部分篇幅与查尔斯·莫里斯讨论文学艺术的本质。莫里斯遥遥呼应早逝的皮尔斯，那时正在发展符号学的美国学派。在三十年代末，无论是莫里斯或是兰色姆的形式论都尚未成形，但这场讨论充满真知灼见：莫里斯从符号逻辑出发，认为符号的“符形”，“符意”，“符用”三个方面，对应三种“话语形式”，即科学，艺术，技术。“符形”与“符意”距离较近，“符用”（符号的使用价值）则是完全另一个层面，因此艺术与技术距离遥远。兰色姆却认为艺术讲究形式，说明它是一个制成品，“更远离科学，而接近技术”，因为艺术“既要认识事物，又要创造事物”，对现实产生影响。兰色姆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“（现代诗人们）证实了本体的真正效用”。

应当说，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见：几乎提前半个世纪，兰色姆预见到形式论将会朝文化—伦理意义转过头去，着眼于文化效用。正

是形式分析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基础，今日理论的文化—伦理关怀，是建筑在对艺术文本形式之上的，是从文本里细读出来的意义。

这不是我在重解文学理论史进程，这是切实的问题：就拿当今“后经典叙述学”最热衷讨论的“不可靠叙述”来说，就是新批评的论战对手却同属形式论阵营的“芝加哥学派”提出来的，反讽是新批评最关心的课题。可靠与否依赖阐释解读，新批评虽是形式论，其立足点却在解读。

五、新批评的“中国化”

中国人读现代理论，总是面临一个令人恼怒的老问题：“西方文论”正在让我们作为“现代文论”来接受。

中国人对什么西方理论都能客观评价，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，做有选择的变通。贫富差基尼系数，无罪推定，罪犯人权，最低工资线，宜居城市标准，甚至台风命名。但是文学理论不行，文化理论不行，西方是西方，中国是中国。这个问题，已经纠缠一百多年，在此无法讨论此问题背后的情结。我只说一下可能的解决办法，最后提出我的一个方案。

有没有可能把“西方文论”中国化？

当然能，从王国维到钱锺书，几代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，证明绝对是能的。用先秦名学说符号学，用陆王心学阐发现象学，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，用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创见，而且确实推动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。很多人发现新批评特别适合中国化：杨晓明论梅尧臣“诗有内外意”是张力论，李良清以中国传统诗学的“气势”说张力；周裕楷论宋人“工拙相半”是“包容诗”；陆正兰以钱锺书“拟声达意”与“姿势语”相比较。这种工作常被人指责为“比附”或“局部中国化”，我觉得此种苛责完全没有道理。迄今为止，中西比较文学最切实的成果，依然来自这些点点滴滴但是切切实实的研究累积。

但是整个批判理论体系有没有可能中国化？如果不能将整个体系变成中国文论，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从“西方”这个体系讲起。但是假定我们真的把整个体系成功地中国化了，也不能解决这个体系在全世界的地位。我在伦敦大学开了多年的“比较文学理论”课程，把现代理论分成二十讲系统讨论。有些人提出来，应当加进“东方理论”，我欣然同意，我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加了“禅宗美学”一课。但是有些学生和老师就提出来，为什么不能讲阿拉伯苏菲神秘主义？为什么不能讲撒哈拉南部族信仰？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体系可言，只能像个拼盘。

也有中国学者反复提出，“中国化”就是采取“拿来主义，为我所用”原则，就是说：如果某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，与我们当今的“精神需要”隔膜，就不必去弄通。这个原则的提出者实际上认为新批评有用。我个人认为，“拿来主义”这个指导思想虽然好，恐怕实行起来不容易，反而造成困惑。原因倒是简单：要切实弄懂了，认真应用了，才知道是否合适，而我们对哪个理论，可以声称弄透了，可以决定取舍了？今日不需要，是否明天也无用？

因此，我在此提出另一种思考方式：我们面对的这个体系，叫做“西方文论”是有道理的，例如新批评的主要提倡者，热爱中国，经常引用中国哲理，而且长期在中国任教，但是无法否认他们是欧美人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过分纠缠于肤色，称之为“现代文论”可能更合适。这个理论，是二十世纪的产物，是一种现代思维，它的确是欧洲文化土壤上自动长出来的东西，原因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，出现了这个气候——现代性思维。而那个时候，在世界其他地方，例如在中国，尚未出现这种气候，正如在二十世纪之前的欧洲，也还没有这个气候。

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，整个当代思潮，借用了大量“东方价值”，用来批评西方现代性。在全球范围内，人们渐渐认同的一套价值观。例如女性主义，环境保护意识，动物保护意识，少数民族权利，多元文化，反无限制科技等等。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

在回向东方智慧：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，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，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；反对“科技无禁区”的人，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；动物保护主义，与佛教的众生有灵力戒杀生有显然的相应；对残疾人、智弱者的关怀，更是佛教式的悲悯；至于老年人权利，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。至少，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，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，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。

因此，当今情况变化了：当代中国文化，与批判理论声气相求，问题对接，论辩也对得上榫口。批判理论从来没有如此让中国学生激动，让中国学者感到有针对性，理论热的大气候已经出现。只要文化气候成熟，批判理论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国文论对接，更可以与当代中国对接。当代中国，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对接。

也就是说，“批评理论当代化”，与“西方文论中国化”，或许能同时进行——实际上也在同时进行。可能不久，我们就可用前一个命题，代替后一个命题。

出版这本书，并且名之曰《重访新批评》，是因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，国内不少年轻学者对新批评方法感兴趣，用之于中国文学，做出了出色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拓宽，他们用批评实践证明了新批评方法，的确有一定的生命力。

甚至有一度时期，新批评的影响被夸张了。1985年，广东文学讲习所所长谢望新在《学术研究》上总结当时批评界情况：“现在较一致的看法，中国‘新批评派’大概有三派，一派是上海吴亮为代表的‘审美派’；一派是鲁枢元的‘心理派’；再有一派是林兴宅等人的‘系统科学方法派’；也包括（刘再复等人）‘主体派’，如果把朱光潜、李泽厚他们较早借鉴外国美学的方法也算作一派的话，那就是四派。”如此说也未免株连过多，不过一时新批评在中国可能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青年学者姜飞的长文《英美新批评在中国》（原为陈厚诚与王宁